

苏州虎丘路新村土墩 M5 “吴侯”小考

常泽宇¹

(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摘要】：苏州虎丘路新村土墩 M1、M5 墓主被发掘者推定为孙吴宗室成员，但这一观点并无坚实证据。综合现场发掘情况与相关文献史料分析，M5 文字砖所见的“吴侯”当指都亭侯吴纂，属“姓氏+侯”类爵称，而 M1 墓主也绝非孙策，不排除其与 M5 墓主分别来自前后不同家族的可能。

【关键词】：苏州 孙吴 墓葬 吴侯 吴纂

【中图分类号】：K871.42 **【文献标识码】**：A

2016—2018 年，江苏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在苏州虎丘路新村土墩发掘了四座三国孙吴时期的砖室墓（M1、M2、M5、M8）¹。其中，位于土墩中部的 M5 出土了“建兴二年”（253 年）纪年砖、“吴侯”文字砖等，无疑是标识 M5 墓葬年代及墓主身份的重要信息²。

简报首先指出 M5 所在的苏州市在汉六朝时期为吴县，新村土墩亦曾出土过载有“吴天之墩”的南宋墓志，且“吴侯”系孙吴时期一个具有明确指向意义的重要封号，故 M5 墓主应是一位封于吴县的孙吴宗室成员。又据开口层位知 M5 晚于土墩中部偏东的 M1，两者位置关系非常密切，加之墓砖的尺寸、砌筑方式均较为接近，所以 M5 墓主很可能是 M1 墓主的晚辈。发掘者还结合 M5 曾遭毁墓、“建兴二年”纪年砖等因素，推断 M5 墓主即《三国志》所载的吴侯孙绍，并将“吴天之墩”解作“吴天子墩”，进而认为孙吴政权内能称得上“吴天子”且与 M1 墓葬发掘情况相对应者，只有孙策“高度相似”³。

笔者认为发掘者的系列论说看似圆通合理，实则证据链条草率牵强，尤其是将“吴侯”文字砖之“吴”视作地名，将“吴天之墩”解为“吴天子墩”，不免有曲解附会之嫌，难以令人信服。

检《三国志》所见“吴侯”者凡五：

1. 孙策。孙策于东汉建安三年（198 年）被曹操表奏为讨逆将军，封吴侯，建安五年（200 年）遇刺身亡⁴，与 M5 之“吴侯”在年代上相差较远，显然可以排除。至于 M1 墓主是否可推定为孙策，后文会有专论，此不赘述。
2. 孙绍。孙吴黄龙元年（229 年），孙权封孙策子绍为吴侯，后改封上虞侯，孙绍再传子奉，至孙皓时被诛⁵。孙绍徙封，即使不葬于上虞（今浙江绍兴市上虞区），也不当在吴县。
3. 孙英。孙吴赤乌四年（241 年），孙权封孙登次子英为吴侯⁶。孙吴五凤元年（254 年）秋，孙英因谋杀权臣孙峻事泄，自杀国除⁷。家人依礼收葬孙英于吴县的可能性似乎很小⁸。

¹作者简介：常泽宇（1995—），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区域历史人文地理、秦汉物质文化史。

4. 孙基。五凤中，封孙霸子基为吴侯。264年孙皓即位，“追和、霸旧隙，削基、壹爵土，与祖母谢姬俱徙会稽乌伤县”⁹。孙基遭孙皓贬斥，当葬于乌伤（今浙江义乌市）。

5. 孙壹。曹魏甘露二年（257年）六月，曹魏封前来归降的吴宗室孙壹为吴侯。四年冬，孙壹被杀¹⁰。孙壹入魏，当葬于北方。

通过对以上五位吴侯的生平梳理可知，将M5墓主推定为孙吴宗室成员，证据并不坚实。

“地名+侯”类称谓一般见于诏书、策命、奏疏等各类官文书之中，如“唯长安侯祜质性忠孝”¹¹、“大将军邳侯袁绍”¹²等例，而目前考古所见的汉晋文字砖用例，则均属“姓氏+侯”类称谓格式。

如安徽亳州东汉董园M1的“为曹侯作壁”¹³、南京江宁孙吴天册元年（275年）倪氏家族墓的“兒（倪）侯”¹⁴、江苏吴县张陵山六朝张氏家族墓的“张侯”¹⁵、江西赣江新区七星堆孙吴周氏家族墓地的“周侯”¹⁶、安徽凤台西晋“马计君”墓的“马侯”¹⁷、河南洛阳朱仓西晋M63的“朱侯”¹⁸、湖北枝江拽车庙东晋永和元年（345年）墓的“刘侯”¹⁹、湖北公安冢子堆东晋墓的“喻侯”²⁰以及湖南汉寿东晋咸康三年（337年）龚道安墓的“龚侯”²¹。其中，董园M1墓主据考为东汉费亭侯曹嵩，而张陵山M4墓主系东晋兴道侯张镇。

事实上，已有学者注意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侯爵称谓倾向于使用受封者姓氏²²。笔者爬梳史籍后也发现东汉三国时期“姓氏+侯”类爵称19例，兹整理成表一²³。

表一中除刘辩、刘协、曹操属特例，刘寔及雍闾之父不详侯名以外，其余14例均具有列侯身份，且文献载之甚明。“姓氏+侯”是这一时期习见的列侯表敬称谓格式，不仅广泛使用于如“曹侯”（墓道及墓砖）、“谯侯”（颂）、“周侯”（墓砖）之类的官方或礼仪场合，也频见于如“蔡侯纸”“贾侯渠”“杜侯”“滕侯”等民间或非正式场合。因此，M5文字砖之“吴侯”恐怕也不出“姓氏+侯”称谓之例。

翻检史籍中的孙吴吴姓列侯，恰好有一位本贯吴县且与M5墓主信息颇为吻合之人——吴纂。据《三国志》载，孙坚之吴夫人家本吴县，后徙钱唐，其弟即丹杨太守吴景。建安八年（203年），景卒官，孙权拜景子奋为吴郡都督，封新亭侯，传子安，后坐鲁王党被诛。奋弟祺，封都亭侯，传子纂，纂妻系滕胤之女。256年孙琳夷滕胤三族，吴纂夫妇遇害²⁴。

首先，吴景本贯吴县，其子奋又任吴郡都督，吴氏一族与吴县的关系可谓相当密切，不排除吴氏族人归葬于吴县的可能性²⁵。其次，吴纂袭封都亭侯，其墓砖模印“吴侯”二字，符合汉晋侯爵称谓之俗。再次，由“建兴二年”纪年砖可推知M5营建于253年前后，而吴纂卒于256年，这与M5的时代基本相符。吴纂夫妇遇害后恐未能依礼安葬，至258年孙休下诏平反，“诏诸葛恪、滕胤、吕据等并无罪见者，并宜改葬，追赠其家，复其田宅”²⁶，吴纂夫妇当在此时改葬于预先营建的吴县寿冢。其后，吴纂墓遭遇浩劫，仅残存发掘时所见青瓷钵、金环等零星遗物，至于何时何人因何缘由已不可考。

关于M1墓主的问题，简报指出以下两点：M1“第一次盗扰当在进行合葬之前”²⁷、“M5建造年代当与M1合葬年代相近”²⁸，也就是说M1在约253年之前即遭盗发。如果M1墓主确系孙策，很难想象有人胆敢在孙吴政权如日中天之时盗发位于孙吴统治重心的孙策墓，且在229—241年间孙策子孙绍就被封于吴县。孙氏先祖葬于富春（今杭州市富阳区）²⁹，孙坚夫妇葬于曲阿（今江苏丹阳市）“高陵”³⁰，目前仅据孙策薨时，周瑜、吕范奔丧至吴的记载³¹，尚不足以断定孙策葬于吴县。笔者较为赞同王志高等学者的意见，孙策的长沙桓王陵应在今马鞍山市采石一带找寻³²。

诚然，M1规制之宏大，丝毫不逊于20世纪90年代发掘的虎丘黑松林土墩M4³³，在苏州地区目前发现的同时期墓葬中无出其右。简报已将其与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墓、安徽当涂“天子坟”孙吴墓相比较，进而暗示出墓主等级之高。但是，韦正也提示我

们要注意在长江下游六朝墓研究中，“墓室规模与数量不总是一个可靠的标准，身份相近者的墓葬规模有时也相差甚远”，以至于依靠现有材料尚无法直接归纳出该地区官吏与庶民在墓葬规格上的差异³⁴。

另外，如依上文笔者对 M5 墓主的考证意见，M1 墓主似可推断为吴篡父祖辈人物，但是，M1、M2、M8 三墓朝向均为正北，M5、M6 两墓朝向均为 172°。平面图上 M5 与 M1 存在的朝向偏差一目了然，墓主分别来自前后不同家族的可能性也不容忽视。

最后，还要附带指出的是，载有“吴天之墩”的南宋墓志已然暗示出虎丘路新村土墩与吴姓家族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吴天之墩”即“吴天墩”，正是典型的名实相符的派生姓氏类小地名。类似地名如亳州东汉曹氏家族墓所在的“曹家孤堆”³⁵、江宁孙吴倪氏家族墓地近旁的“倪塘”³⁶、江宁上坊孙吴宗室墓所在的“孙家坟”³⁷、吴县六朝张氏家族墓地所在的“张陵山”³⁸以及宜兴西晋周氏家族墓地所在的“周墓墩”³⁹等。发掘者不察，反将虎丘路新村土墩附会为埋葬有孙策的“吴天子墩”⁴⁰。事实上，孙策始终不在吴天子序列之内，孙权称帝后仅将其兄追封为“长沙桓王”⁴¹即是明证。

注释：

1[1]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江苏苏州虎丘路新村土墩三国孙吴 M1 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9 年第 6 期。

2[2]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江苏苏州虎丘路新村土墩三国孙吴 M5 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20 年第 6 期。另，张今据残笔补释出 M5 砖：8“凤”下的“皇”字，并将之视作末帝孙皓年号的“凤凰”，参氏著：《建康、三吴地区出土六朝砖铭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 年。笔者赞同“皇”字的补释意见，但还应注意的是，凤凰乃汉晋符瑞之大端，在出土文献中也较为常见：山东沂南鲍宅山西汉“凤凰”刻石、尹湾汉简《神鸟赋》“凤皇（凰）孤而高羊（翔）”、山东苍山元嘉画像石墓题记以及相关东汉镜铭材料，分见 a. 彭作飏、赵学波：《有纪年最早之画像——沂南鲍宅山凤凰画像题字》，《东方艺术》2011 年第 16 期；b. 连云港市博物馆等：《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 1997 年，第 149 页；c. 毛远明编著：《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 1 册），线装书局 2009 年，第 173-175 页；d. 孔祥星、刘一曼、鹏宇：《中国铜镜图典（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 年，第 371、393 页；e. 王纲怀：《汉镜铭文图集》下册，中西书局 2016 年，第 443 页。因此，仅就目前简报中发表的两例含“凤”字的刻划文字砖，尚不足以断定其为年号。

3[3] a. 吴楠整理：《20 多项重要考古发现：多视角展现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真实面貌——“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新发现”交流报告会在南京召开》，[EB/OL][2021-12-27][2022-01-03]http://arch.cssn.cn/kgx/xccz/202112/t20211227_5385220.shtml；b. 张铁军、朱晋詠：《苏州虎丘路孙吴墓及墓主身份考证》，《大众考古》2021 年第 12 期。另，M1 系孙吴宗室墓葬的看法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认同，可参王音：《曹魏、孙吴墓葬比较研究——以宗室墓为中心》，《中原文物》2021 年第 3 期。

4[4]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四十六《吴书·孙策传》，中华书局 1959 年，第 1108-1109 页。

5[5] 同[4]，卷四十六《吴书·孙策传》，第 1112 页。

6[6] 同[4]，卷四十七《吴书·孙权传》，第 1144 页。

7[7] a. 同[4]，卷五十九《吴书·孙登传》，第 1366 页；b. 同[4]，卷六十四《吴书·孙峻传》，第 1445 页；c. 同[4]，卷四十八《吴书·孙亮传》，第 1152 页。

8[8] 孙权次女鲁育公主遭孙峻诛杀后，“埋于石子岗”，直至元兴元年（264 年）冬十月方以礼改葬。另据《搜神记》载：“后主欲改葬主，冢瘞相亚，不可识别”，此例可为孙英未依吴侯礼收葬之佐证，参唐·许嵩撰、张忱石点校：《建康实录》卷四《后主》，中华书局 1986 年，第 90 页。

- 9[9]同[4]，卷五十九《吴书·孙霸传》，第1372-1373页。
- 10[10]a.同[4]，卷四《魏书·三少帝纪·高贵乡公髦》，第140-143页；b.同[4]，卷五十一《吴书·孙奂传》，第1208-1209页。
- 11[11]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五《安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第204页。
- 12[12]同[4]，卷一《魏书·武帝纪》注引《献帝起居注》，第22页。
- 13[13]亳州市文物管理处：《安徽亳州董园村一号墓》，《文物研究》第20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
- 14[14]a.南京市博物馆：《南京郊县四座吴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文物出版社1983年；b.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南京江宁孙吴“天册元年”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9年第3期。
- 15[15]a.王新、叶玉琪：《吴县张陵山发现晋代铭文砖》，《东南文化》1985年第1辑；b.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张陵山张氏墓群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05年第4期。
- 16[16]国家文物局主编：《201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20年，第124-128页。
- 17[17]凤台县文物管理所：《安徽省凤台县发现一座西晋墓》，《考古》1992年第11期。
- 18[18]张今：《洛阳朱仓西晋墓地性质蠡测：由四则砖铭校补谈起》，《出土文献》2021年第4期。
- 19[19]宜昌地区博物馆、枝江县博物馆：《湖北枝江县拽车庙东晋永和元年墓》，《考古》1990年第12期。
- 20[20]荆州专区博物馆：《公安县发现一座晋墓》，《文物》1966年第3期。按，林昌丈以之为“喻姓封侯者”，可从，见氏著：《汉魏六朝墓砖铭文辑录校释》（一），厦门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15-316页。
- 21[21]王永彪、张海波：《省文物部门在常德的考古发现》，常德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常德年鉴2016》，方志出版社2017年，第340页。
- 22[22]苏俊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姓氏与封爵称谓——从吴简中的“步侯”、“吕侯”说起》，《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 23[23]a.同[11]，卷十《皇后纪下·灵思何皇后》，第449页；b.同[11]，卷二十六《伏湛传》，第898页；c.同[11]，卷三十二《樊儵传》，第1125页；d.同[11]，卷三十七《桓荣传》，第1251页；e.同[11]，卷七十八《蔡伦传》，第2513页；f.同[4]，卷一《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第32页；g.同[4]，卷十二《魏书·何夔传》注引《晋诸公赞》，第382页；h.同[4]，卷十五《魏书·贾逵传》，第482页；i.同[4]，卷二十八《魏书·诸葛诞传》注引《魏氏春秋》，第769页；j.同[4]，卷二十九《魏书·管辂传》案，第828页；k.同[4]，卷三十五《蜀书·诸葛瞻传》，第932页；l.同[4]，卷四十《蜀书·廖立传》，第997页；m.同[4]，卷四十二《蜀书·谯周传》注引《益部耆旧传》，第1033页；n.同[4]，卷四十三《蜀书·吕凯传》，第1047页；o.同[4]，卷六十四《吴书·诸葛恪传》注引《志林》，第1440页；p.同[4]，卷六十四《吴书·孙綝传》，第1446页；q.同[4]，卷六十四《吴书·孙峻传》，第1444页。

24[24]a. 同[4], 卷五十《吴书·孙破虏吴夫人传》, 第 1195 页; b. 同[4], 卷五十《吴书·吴景传》, 第 1195-1196 页; c. 同[4], 卷六十四《吴书·孙綝传》, 第 1446 页。按, 百衲本“奋弟祺”下无“嗣”字, 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4 年, 第 578 页。赵幼文已指出“嗣”系衍字, 今从之, 参氏著:《〈三国志〉校笺》卷五十, 巴蜀书社 2001 年, 第 1644 页。

25[25]有学者指出“归葬之俗在孙吴时期一度受到统治者的抑制而趋于没落”, 并将考古所见的孙吴将相名臣不归葬之情形与嘉禾六年(237 年)定长吏奔丧之科相因果, 见张科:《论瑞昌马头“西晋”墓的年代与归属——兼谈孙吴时期的不归葬》,《东南文化》2021 年第 6 期。不过, 笔者以为此科文仅针对未暇交接而奔丧废职者, 并非一刀切地禁止长吏奔丧。因此, 很难说会对孙吴将相名臣归葬与否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将相名臣不归葬或从赐葬陪陵等角度考虑为妥。同时, 文献中也并不曾见到孙吴时期归葬之俗一度趋于没落的迹象, 如会稽余姚人虞翻就“归葬旧墓”, 见《三国志》卷五十七《吴书·虞翻传》, 第 1324 页。此外, 还要指出的是, 张文将孙权君臣议定奔丧科文误作“黄龙六年”之事, 参《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孙权传》, 第 1141 页。

26[26]同[8], 卷三《景皇帝》, 第 80 页。

27[27]同[1]。

28[28]同[2]。

29[29]a. 同[4], 卷四十六《吴书·孙坚传》注引《吴书》, 第 1093 页; b. 清·杨守敬、熊会贞著, 段熙仲点校, 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卷四十《浙江水》,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 年, 第 3285 页。

30[30]a. 同[4], 卷四十六《吴书·孙策传》, 第 1101 页; b. 同[8], 卷二《太祖下》, 第 60 页。

31[31]a. 同[4], 卷五十四《吴书·周瑜传》, 第 1260 页; b. 同[4], 卷五十六《吴书·吕范传》, 第 1310 页。

32[32]王志高、王俊:《马鞍山孙吴朱然家族墓时代及墓主身份的分析》,《东南文化》2008 年第 5 期。

33[33]黑松林土墩 M4 为苏州地区已知的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砖室墓, 出土有石屏风一套, 苏州考古工作者亦点出其为周瑜家族墓的可能性, 分见 a. 姚晨辰:《苏州黑松林出土三国时期石屏风》,《中国文物报》2020 年 1 月 17 日第 6 版; b. 何文竞、吴玲:《六朝从这里开始: 苏州地区发现的大、中型六朝早期墓葬》,《大众考古》2020 年第 11 期。

34[34]杨泓、朱岩石主编:《中国考古学·三国两晋南北朝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年, 第 151 页。

35[35]安徽省亳县博物馆:《亳县曹操宗族墓葬》,《文物》1978 年第 8 期。

36[36]张学锋:《六朝建康都城圈的东方——以破冈渚的探讨为中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32 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

37[37]a.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 年第 12 期; b. 王志高、马涛、龚巨平:《南京上坊孙吴大墓墓主身份的蠡测——兼论孙吴时期的宗室墓》,《东南文化》2009 年第 3 期。

38[38]同[15]。

39[39]罗宗真：《江苏宜兴周墓墩古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8期。

40[40]即使“吴天之墩”能作“吴天子墩”解，也很难说会与墓主身份存在对应关系。东南及华南地区的例证，如浙江安吉的“天子岗”为孙吴至西晋时期的朱氏家族墓地，见张秋华：《浙江安吉天子岗孙吴、西晋墓墓主蠡测》，《东南文化》2017年第4期。再如广州西村“皇帝冈”，发掘的52座汉唐墓葬均与帝王无关，分见 a.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皇帝冈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第4期；b.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西村皇帝冈42号东汉木槨墓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8期。

41[41]a. 同[4]，卷四十七《吴书·孙权传》，第1134页；b. 同[8]，卷二《太祖下》，第37-38页。